

The World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圣经的文学世界

[美] 罗伯特·奥尔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World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圣经的文学世界

[美] 罗伯特·奥尔特 著

成梅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的文学世界/(美)罗伯特·奥尔特著;成梅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485-0

I. ①圣… II. ①罗… ②成… III. ①《圣经》—文学
研究 IV. ①B971 ②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7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圣经的文学世界

〔美〕罗伯特·奥尔特 著

成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85-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3/4

定价:29.80 元

目 录

前言 / 1

致谢 / 5

第 1 章 独特的文学 / 6

第 2 章 圣经指令和文学处理 / 29

第 3 章 《圣经》的文学特征 / 50

第 4 章 叙事详述及文字的力量 / 87

第 5 章 引喻与文学表达 / 108

第 6 章 文学批评与评注问题 / 132

第 7 章 探寻作者 / 153

第 8 章 诗歌之媒介 / 172

第 9 章 《圣经》和文化 / 192

注释 / 211

索引 / 218

前 言

我此前有关《圣经》的两本书《圣经叙事的艺术》(1981)和《圣经诗歌的艺术》(1985),是试图分析、解说圣经文学两种主要类型的入门书。本书作为第三本,涉及《希伯来圣经》、律法显见的写作方式,正如最近有两三位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或许跟与其相关的叙事语境存在有意的联系,但对我来说,这本书在形式和目标上,与文学类型体系相关的程度,都不足以延续我在前两本书中所进行的那些解析。

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初次被吸引做这个学科的研究时,有关人们可以严肃地、甚至是严格地将《圣经》作为文学来理解的观点,相对而言还比较新颖,而真正去做这种研究尝试的,除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还处于摸索阶段。鉴于这种情况,笔者的研究,也许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荒野中的呼唤。现在则可以高兴地宣称,自那时以来,对于《圣经》的文学讨论,已经出现生机勃勃、令人兴奋的系列发展。文学研究学者和圣经研究学者都对这一新运动做出了宝贵贡献。这一新运动旨在重新界定我们与文化的两大策源地之一的古老文献之间的关系。一些有关这个学科的新近出版的书籍将文学分析运用于某些特定的圣经文本,或

者试图将文学方法、历史方法及文本批评的研究融合在一起，或者探讨圣经文学整体特质、效用，是什么使它与西方传统中其他较晚出现的文学相关或分离。通过研究这些新成果，我获益匪浅。即使那些与我意见相左的批评家，如诺思罗普·弗赖伊和哈罗德·布卢姆，也提出若干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从而引导我（我得考虑一下是否还有其他人）重新考虑支撑对于《圣经》的任何可能的文学阅读的基本推论。

本书正是致力于这些推论的一系列再思考。为与这一目标保持一致，我在本书中未收入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几篇讨论《圣经叙事的艺术》一书未尽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对我在那本书中提出的概念的详细阐述，如有关类型场景的观点，就是对我所忽略的一些有关圣经叙事的诗学探讨，如穿插在更大的叙事篇章中的情节或事件。本书有一章或许也可以作为《圣经叙事的艺术》一书的一章，如果十年前我足够精明，能意识到对古代希伯来作家来说，
x 圣经内部的引喻是何等重要的话。这就是关于引喻的那一章。然而，对我来说，那些讨论对这本书的探讨来说，也很必要，因为我认为引喻是颇具特色的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是界定《圣经》的文学特质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的大部分论文中，我都是从分析具体实例出发，进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语境和理论范畴予以讨论；抑或从宏观议题出发，而后试图通过解析实例来探讨这些议题。我所撰写的所有文字（不仅是关于《圣经》的文字），几乎都来自原则上元批评（meta-critical）或理论思考不能与形式分析相分离这一信念。如果你想去探

究《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或者是什么样的书的总集；想知道《圣经》里有些什么隐含或彰显的元素，什么样的心照不宣的文学概念影响了古代希伯来写作，古代以色列文学和后来的世俗文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那么你就必须从文学文本的视角来看待其表达而起步。作家如何想象情景，叙述细节，设计对话，建构诗行的对称美，展开诗歌意象，都能让人们对其如何描绘人的本性、神的本意、历史、命运、因果关系，以及作家与文学媒介的关系了解甚多。

在这本书中我对圣经文学的全球化体现的关心——这种关心因为最近颇为活跃的有关《圣经》作为文学媒介的特质的讨论而更为强烈——使我深思潜在的相关定义和概念化等事宜。以我们基本上属于涉及文学表达的世俗理念，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将《圣经》视为文学予以探讨？如果文学是自由想象技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如此放任自流，乃至具有颠覆性的冲动能在《圣经》这种宗教目的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十足的文本中占有一席之地吗？在文学技巧和圣经的历史方法或文本批评方法之间，是否存在清晰可辨的方法论上的优先性或互补性？在现代评论中，这些方法中的任 xi 哪一个又扮演何种角色？在我们有关文学的观念中，作家是与其密切相关的。然而，在以匿名为规则的文本里，在作家与编辑已合而为一，成为民族传统的统一代言人时，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原作者？这一曾经具有权威性的集子在当代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将《圣经》视为文学作品重新挖掘的尝试是否会对这种地位产生影响？叙述和诗歌等媒介与圣经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世界观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都是非同小可的问题，我无意妄求给出适当的回答。如果

这本书能够让读者在某一方向思索如何面对这类问题，我就颇感欣慰了。我本人作为读者和批评者，这种面对，正如已经说过的，几乎总是涉及在某种程度上密切关注一些特定的文本。在我撰写的各类专著中，我都坚持不懈地以不同的方式这样做。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修辞的考虑，使我的论点更生动，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而且是出于认识论的考虑，因为对我来说，泛泛而谈的理论或批评都无足轻重，除非能经得起复杂的实例的验证。因而，这本书一如《圣经叙事的艺术》和《圣经诗歌的艺术》，有显而易见的细致解析特定实例的偏好。不过，在前两本书里，解析特定实例的过程往往以界定《圣经》中两种重要文学体裁的技巧为目的，而《圣经的文学世界》则尝试讨论对于圣经写作的领悟，涉及其整体方法，并探讨《圣经》何以是文学，而不是仅仅涉及具体经文。关于这样的议题，显然不可能有绝对的论述。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对如今已经相当热烈的有关这些仍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的，总是无从捉摸，却又总是令人神魂颠倒的经文之特质的讨论增添有益的

致 谢

本书第 3 章和第 8 章最初在《圣经文学指南》一书中出现。这本书 1987 年出版，是我和弗兰克·克莫德共同编辑的。我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准许我在此书使用上述内容。第 6 章、第 7 章和第 9 章作为几篇文章最初发表于《评论》（发表时间分别是 1990 年 3 月、1991 年 11 月、1985 年 8 月）。我感谢该刊物的编辑给予我这几篇论文的版权。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的日常花费，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1937 级教授资金提供。我还感谢珍妮特·利文斯通在打印方面所给予的真诚帮助。本书中所有《希伯来圣经》的英译文均出自我本人的翻译。我的翻译往往有意牺牲英文表达的得体和优雅，以便保留原文的某些特色，但我希望相关文学分析能够证明这样的做法不无道理。

第 1 章



独特的文学

文学视阈的圣经研究这一新潮流十余年来日益发展起来，可望对圣经研究和文学研究均产生深远影响。这项学术发展或许还能产生某些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因为正如我在第 9 章所详细论证的，这一研究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认真阅读《圣经》，而不是挑选一些成分，将其重新建构，搜寻隐含于经文背后的真实本文或历史真实。不过，在阅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究竟怎样才是恰当的阅读这些议题上人们意见不一致，也不足为奇。

采用现代理论从文学角度来探究《圣经》，必定要与两个主要困难做斗争：其一是圣经文本形成和发展完善的特定环境，其二是特定的目的，甚至于是圣经的文学艺术所指向的特定的表现目的。首先，我将对文本问题如何使从文学角度探讨圣经的批评家备感困惑的情况予以阐释。

无论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批评家来说，阅读文学作品都要预知一个假定的作者身份，那可以追溯到希腊悲剧的作者，至维吉尔；甚至还可再早数百年，追溯到人们设想中的作家荷马。通常，作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敏锐感觉和丰富经验的人，势必给作品打上个人的烙印，无论“中性”语言、相反的词语或者口技会如何起到掩

饰的作用。文学理论界一个流行于法国的做法，是寻求用如同游戏场的非个性化文学代码式的文本概念来取代真实存在的作者，但这种意图似乎越来越显现出其片面性，有关普通读者对于提供各类信息的作者之存在的认识也由大多数批评家的实践得到证实，即使在这个后现代时期也是如此。作者基于个人错综复杂的生活经历，通过对生活的表现或反思与人们交流，这样一来，阅读行为就成为一种对谈——作者在说，读者在思索——就此形成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同时还是文学作品这个统一体的内在保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许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意识流、嘲讽叙事诗、超现实主义戏剧之间跳跃、滑动，但是作为读者，即使是对小说构造理论一无所知的读者，也知道这是彻头彻尾、显而易见、游刃有余的乔伊斯式作品。¹

对《圣经》来说，情况完全不同，这让我们所有将在文学视阈对《圣经》予以分析的学者颇感困惑。圣经传统本身是不遗余力地隐藏具体作者的痕迹。没有作者说明，没有希腊人的文学竞赛观念，²没有任何具体作者渴望通过文学成就而永垂史册（西方文学中常见的传统主题和重要观点）的迹象。相反，圣经作者消失于传统中，将传统视为自己的声音，反之亦然。事实上，我们在方法论上的困惑之一就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两个决定性因素中哪一个主要的：是作者手头有大量系统的口头传播的素材，从而对其予以综合呢，还是作者通过借鉴叙事传统，自行创作了自己的文字作品，其风格模仿了存流于人们记忆中的古老权威及神学知识？没有巧妙的方法来消除传统因袭的匿名这一托词。尽管学者们的分析已经发现经文中

存在着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各种观点，并已经寻求把这些观点与各类社会团体、地理和时间背景相联系，事实却是所有这样的联系都仅仅是建立在推测之上，许多世纪（而不是几十年）以来，研究者们对特定作者和特定流派的年代一直争论不休。

圣经作者的匿名，以及对他来说来龙去脉的缺失都因为《圣经》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编辑过程而十分错综复杂——《圣经》本身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流传于世的。与其他古代文本类似，不少篇章颇为令人困惑，如手抄的评注、其他各种插补片段、转录笔误以及不时出现的批量性的段落混乱。但是，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更为严重的是圣经故事通常显现出从不同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文学源流拼凑而成的迹象。这一过程在《圣经》的不同部分情况各异（《摩西五经》首4卷就包含有差别明显的经文；见第215-216页），但是在更宽泛的范围内，情况是这样：在古代以色列，比如说大卫王王朝的早期，同样的一系列事件会流传有两种或更多的文学版本。编辑一般从主要源流中选择其一，又保留另一种或其他多种相互竞争的版本中的片断，将所有资料纳入自己的编辑框架，并在必要时有所调节。稍晚，约从巴比伦流放返回的早期，编辑者使经文最终形成定稿，对措辞做了局部修改，增添了编辑框架，或许筛选出某些材料，甚至融入一些当今文本中不复存在的传统元素。所有这些都说明尽管大卫王是叙事文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他的故事却建立在与任何后来西方的主要叙事方法都截然不同的文本模式之上，那些西方故事从头至尾都是出自一个大师之手。

文学视阈的圣经读者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困境呢？人们时而会听

到这样的指责，即新近出现的对于《圣经》的文学批评，并非在教义上，而是在方法论上表现了原教旨主义：经文的每一因素都显现出与其他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并在艺术上有存在的道理。我还想不出有哪一位在文学视阈审视《圣经》的当代评论家在著述中认同这一描述，并将其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倒是几位评论家似乎时不时在他们的评论中认可这一点。所有这些批评家都承认已被接受的经文也还存在一定问题，有时需要订正或其他解决方法；他们还认为混合而成的经文中多而杂的假说不能随便予以消除。

然而，他们的分析却一再论证了经文最终版本中所达到的令人吃惊的艺术上的一致程度。历史地来看，这归根结底是对编者的艺术，抑或是对于使用更早素材、具有很强综合能力的作家艺术的论证——编者只是对他们的作品做了润色。如果说赞同这种可被称为编辑整体性存在的人有时在保留经文艺术性的一致上表现得过分有创意了，不过他们却使大家，特别是训练有素的圣经学者以新的方式重读《圣经》，因为这样一来效果通常非常好。一些研究著述如 J. P. 福克尔曼的《〈撒母耳记〉中的叙事艺术与诗歌》、罗伯特·波尔青的《〈撒母耳记〉和〈申命记〉的作者》、迈尔·斯滕伯格的《圣经叙事诗学》（这本书包含了人们可能达到的最卓越的细致解读），都以一个又一个的个案说明：在已被接受的经文的元素中，存在着比最近两个世纪的圣经学者所想象的多得多的恰到好处的相互呼应，或是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与编辑整体论者观点相对的一个策略，是将文学视阈的圣经阅读建立在长期在圣经研究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源流批评的若干结论上。

这就是说，如果作者不明，明显具有合成特质的已被接受的传统经文与现代批评家有关抓住个人文学想象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话，或许可以通过经文与学术界已经识别出来的组成部分，或是层面、文献等之间的联系挖掘出作者。被标明 J 或 E 或 P 底本的部分，或《申命记》的作者，或《撒母耳记上》与《撒母耳记下》中所谓的宫廷编史家，都可以如此被赋予个人色彩、性别、艺术及政治行为。而且，如果批评家愿意的话，还可以赋予他们历史和社会定位。

对这种方法最震撼的运用，莫过于哈罗德·布卢姆的《J书》。布卢姆在耶鲁的同事莱斯利·布里斯曼运用类似的有关作者的观念，在《雅各的声音：关于〈创世记〉的构成》中表现出一种独出心裁，但却并不夸张地将 J 和 E 底本资料当作作者来阅读的做法。尽管专注于作者的批评家具有迫使我们重新思索有关《圣经》的惯常推论的优点，但是他们的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充满方法论上的左右为难，这使对于编辑整体性的过度说法似乎显得相对来说不再重要（见第 7 章）。圣经文本的任何组成部分是否真是一部整体的文学作品，反映 5 某一作者的创作及历史长河的某一时刻，目前仍然存在疑问。此外，根据一些微妙的文学理由如风格、感受等来区别圣经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另一个组成部分，实在是太困难了。这些困难甚至使得一些圣经学者对于四经中是否真的存在独立的 E 底本源头产生怀疑。即使有人能够信心十足地假定作者的笔法可以辨认出来，但是他的痕迹，或者对布卢姆来说，她的痕迹，即个人文学创作的实际结果并非是完整的经文，而是各种各样长短短通过分离、切割和润色编辑而来的片断。

戴维·达姆罗施在《叙事圣约》一书中提出了第三种方法——这本书颇有创见，不仅尝试将圣经叙事纳入古代近东文学史的范围之内，而且始终铭记经文的合成性特质。这一方法我原则上部分同意，尽管有时会因原则在实施中的问题而持不同见解。达姆罗施认为《一千零一夜》堪称与圣经类同的东方作品，它是一个“在文本逐渐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将多方面的合成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作品的完美例子。虽然这个术语“合成艺术”是取自我的著述，但达姆罗施认为我在《圣经叙事的艺术》一书中详细说明的——在历史评论中所揭示的“混乱的经文片断”和文学评论中所追溯到的“有为之的形式”之间——所做的这个选择是不正确的。他的科研项目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结合”，这一研究揭示的则是：

或许可以称之为有为之的拼合文本，尽管这个形象化描绘缺乏足够维度，因为几个不同的拼合文本之间存在相互交织和覆盖的关系。在重新构建这一四维形式时，我们既同意又反对经文所涉及的不同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还会被引入对于特定段落的多视角阅读。为了真正公平评判圣经叙事的动态性质，我们必须经常同时以三种甚至于四种方式来阅读一个段落。²

我颇为喜欢达姆罗施作为对我的陈述的修改，所提出的多维形式的有为之的拼合文本这一新奇的描绘。它令人赞叹地保留了圣经经文的突兀感及圣经对相异素材的一次次使用。任何细心分析过《圣经》的希伯来原文的人都能清楚看到这后一个特色。（相比之下，

编辑整体论者更倾向于称其为天衣无缝的整体，尽管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不过，我在两点上不同于达姆罗施的观点。出于对未经确证的协调一致的疑虑，或许还因为他的边缘描述中的解构视角，他把经文看作相互抵触的各种声音的混合物。我承认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但我同时还一次又一次地对许多例子中所显现的有力的综合式想象印象深刻。正是这种综合式想象，成功地使曾经相互抵触的声音，成为令人信服的具有综合性的文学整体中的元素。在这一点上，圣经经文概括性的结构特色和细致的文学性连接常常使我不得不与赞同编辑艺术的人站在一起。对我来说，达姆罗施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种侧重“文本所涉及的各位作者”的文学批评，必须能够有一定把握地区别这些作者。我认为这一点的实现通常要比达姆罗施所设想的困难得多。他的书里充满机敏的分析，然而，有时候在他所认为有三个来源的圣经故事中，我只看到两个或一个来源，当然，一些文献学研究方向的学者或许会从中发现四个或者五个来源。于是，达姆罗施将文学批评和历史学批评结合起来的努力和作者论的批评家一样，都存在方法论上的左右为难。

加布里埃尔·约西波维奇在反响最大的、有关圣经的文学思考成果之一《上帝书》中，就恰当地说明了源流批评所刻意回避的认识论困惑：

提出文献资料假说的学者相信只要尽量识别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事实。按照 19 世纪的方法，他们

认为事实与起源密切相关。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的方法论必然是自我应验的：先入为主地确定《旧约》作者或《申命记》的作者写了什么，然后将不符合这一看法的观点叫作篡改。这种情况，如所有的优秀读者所知，将会导致阅读的死亡，因为一本书永远不会特别吸引我，如果我从中接受的只是我认为注定会在其中的内容的话。³

19世纪倾向于从源头寻求事实的批评方法尤为高明。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源头往往非常难以接近，现在十分清楚的是，当我们研究古老经文时，我们探求源头的尝试常常不得不冒险采取从历史和传统积淀中的痕迹和线索予以推测的方法。尽管我们意识到《圣经》可能有一系列源头，但我们最依赖并且作为阅读对象而拥有的仍是在传统框架中所产生的经文。此刻，一位像达姆罗施这样富有经验的当代读者，毫无疑问会立即反驳说他所建议的，绝不是使阅读死亡，而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这种新模式包含对立的意义轨迹，在解构的同时重构圣经经文。这堪称是一项英勇的事业，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值得信赖的对于经文各个部分的识别，即来自约西波维奇所描述的解释学体系的经文——也就是 8 说，是来自强加在折中了阅读的开放式反应的具有历史偏见的经文的解析。

约西波维奇之评述的结论强调其著作注重的是《圣经》作为文学的实体特质——这与文本阐释相对立。很明显，《圣经》不是一本或是一套旨在为人们提供娱乐性阅读同时又富含洞见和知识的书，